

武部六藏同其他日本战犯一起，被押送至苏联赤塔市附近的莫洛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收容所、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等地关押。

1950年7月，武部六藏和其他968名日本战犯一起，在绥芬河由苏方移交给中国政府。7月21日，押运日本战犯的专列抵达抚顺，将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武部六藏在关押期间，因患重病一直卧床不起，未曾参加任何活动。1952年的一天，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而致嘴歪眼斜，半身瘫痪，病情危重。对他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管理所的医务人员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力抢救，使其免于—死，待病情缓解后，又精心进行护理。

195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犯罪案。武部六藏因病未能提解到庭，经法庭裁定另派审判员前往养病地（沈阳医学院十病号）审讯。武部六藏对证人证词均表示“完全属实”。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武部六藏有期徒刑20年；同时裁定，根据其身体情况，提前予以假释，遣送回日本，1958年1月武部六藏病死于东京。

伪满总务厅长长岸信介

王國玉

(一)

岸信介，日本山口县山口市人，1896年11月13日生。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22年进入日本政府农商

省（后来分为农林、商工两省进入商工省）任书记官。他广泛联络政界、军界的少壮派，竭力主张统一国内政治，充实国防，维护国权和国外的权益，实现对外侵略的日本大亚细亚主义。

岸信介在大学读书时曾翻译出版德国《交易场法》，后又撰写一本导致垄断资本大鱼吃小鱼的《重工业统制论》，于是他成为日本财阀所注目的人物。他进入操纵日本经济的商工省不久便由书记官当上了事务官。1926年至1931年曾两次派往欧洲驻外使团。1933年任商工大臣官房文书课长。

岸信介竭力倡导统制经济，对于中小型工商业亦主张加以统制。1933年在日本内阁直属下成立了总力战研究所，所长是参谋本部高级参谋饭村让少将，成员有岸信介和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其他省的课长，还有伪满国务院各部的日本人课长或参事官，他们都是极力主张侵略亚洲的中坚分子。总力战研究所的任务是对进攻中国、亚洲及发动太平洋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和制定计划。军职人员研究作战计划和所需的人力物力的数量；文职人员研究如何筹划所需的这些人力物力。岸信介来自商工省，对于此项人力物力的筹划和生产，统由他领导和掌握。他认为这些人利物力的资源基地不只是在日本，而主要的是在伪满洲国。

1934年总力战研究所升格为企划院，由日本军界很有势力的前台湾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柳川平助任总裁，下设5个部，岸信介兼任其一个部长。1935年岸信介兼任商工省对满事务局事务官，这样就更便于他对于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所需要的军用物资，由他一手来计划和决定了。他以商工省和企划院双重职权使日本财阀和资本家适应其生产军需物资的计划，实行重工业统制政策，以大鱼吃小鱼的手段，逐渐实现了战时体制的生产政策。这就使岸信介和日本垄断资本家结成了密切关系，而岸信介则

成了一个熟悉和掌握日本经济力量，善于操纵日本财阀并愿意和军部合作的人。当时，日本经过70年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制，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军部强力主张改变为“国防计划经济体制”，这和岸信介倡导的统制经济一脉相通，所以岸信介就更成为军部难得的一位宝贵人物了。

1936年初，岸信介升任商工省工务局长，更明确地提出以日本国内所有的资源做为战争需要物资供应基地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更多地依靠满洲国的资源。他主张在还没有经过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满洲国，由原始产业开发时起，便实行统制经济，实行“日满经济一体化”，来“确保高度国防经济体制”，从而妄想完成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这就是把伪满经济完全置于关东军的武力控制之下，实行所谓国家垄断，把伪满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使伪满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兵站。为了实现这种目的，1936年10月，岸信介肩负着日本军部的委托，充任伪满实业部（后改为产业部）次长，直接主持对伪满经济逐步实行全面统制与掠夺。

（二）

伪满初期，曾以明令公布过“暂时援用旧法”的法令。1933年3月，伪满公布了由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调会炮制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提出了对伪满实行经济统制的方策。规定：对带有国防的或公共公益性性质的重要产业以公营或令特殊会社经营为原则；对其它产业则委诸民间自由经营，但要对生产消费两方面施以必要的调剂。随后，又于1934年6月，公布了《对一般产业的声明》，划分了统制产业与自由产业的界限，即属于国营、公营或特殊会社经营的统制产业22种，需经有关部门许可的产业24种，可以自由经营的产业20种。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行业和部门，尚可以得到自由经营，而不受限制，有些行业虽受到一些限制，但仍可在法令的允许下进行经营。

1936年10月，岸信介来到伪满实业部任次长后，便积极准备加强伪满的经济统制。他在来伪满之前同日本内阁企划院、日本军部拟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要纲》草案。他到伪满实业部任职后，首先在这个部增设资源调查局。局长是他在日本商工省任工务局长时的心腹人文书课长椎名悦三郎。他通过资源调查局更多地掌握伪满洲国资源的情况，以便于推行《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要纲》，对伪满经济实行全面统制和掠夺，奠定全面侵华战争的物资基础，在日本和伪满同时建立准战时体制，把伪满经济纳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

1937年1月25日，确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要纲》最后决定案。规定“以战时所需要资源为开发重点，尽可能力求实现国内的自给自足和供给日本所缺乏的物资，为将来满洲国的生产发展奠定基础。”这个五年计划要纲的宗旨就是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为日本战时经济服务。要纲把开发的产业分为工矿、农畜、交通三个部门，重点放在工矿业。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在工矿部门着重于国防军工企业，并包括电力、燃料和冶炼业的开发。其目的就是紧急增产日本战时缺乏的物资，对东北进行全面的物资掠夺。1937年5月1日，伪满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成为岸信介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重要法令，强化了以国防产业为主体的日满经济一体化。岸信介操纵控制的产业部是实施《重要产业统制法》的主管部，不但对企业采取许可制，而且对生产过程也加以严密统制和监督。对产业统制的范围不断扩大，连纺织、面粉、制糖、苏达、肥料、啤酒、烟草、水泥、制油、火柴等工业也包括在内。

岸信介于1937年任总务厅次长，仍兼任产业部次长。他为

了发展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中的首要产业，即生产军用物资的军需企业，和日伪有关部门首脑一起，于1937年12月27日在新京创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它是一个综合地开发东北地区蕴藏很丰富的铁、煤炭、液体燃料、电力、轻金属等重工业资源，包括从原料工业一直到制造飞机、汽车等高级机械工业的大规模的重工业公司，简称“满业”。满业总裁是日本近代财阀鲇川义介，他把在日本综合经营的“日本产业开发株式会社”（康采恩）从日本迁至中国东北。满业创立时，鲇川“日产”的资本是22 500万日元，伪满政府也做了22 500万日元的投资，总资本计为45 000万日元。满业发挥了变东北为日本侵略中国、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的作用。

鲇川义介和他的日产之所以能迁来东北，很重要的一条应归功于岸信介的游说。岸信介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是同乡，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鲇川义介有姻亲关系，他们都属于左右日本政府的长州藩派系。岸信介依靠这种关系，满足了鲇川义介的全部要求，把日产全部迁移到满洲国，垄断了伪满的重工业。其具体情形是：1936年夏，关东军司令官以满铁总裁的名义邀请日本产业资本家来满，使其观察满洲的实际情况，征求关于产业开发的意见，其中对满洲最表关心的是鲇川义介。鲇川义介认为“满洲”应在丰富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重工业，主张从制铁、煤炭等基础原料工业到飞机、汽车及其他制造工业进行一贯的综合经营。

随后，在“七·七”事变后的紧急事态下，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首脑们，对鲇川义介的主张很感兴趣，期望日产财阀到伪满来投资，请鲇川义介承担急速开发伪满重工业的任务。于是进行了秘密谈判。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第四课长片仓衷和总务长官星野直树，特别是早就是鲇川莫逆之交兼同乡的产

业部次长岸信介等，为引出鲇川而奔走。答应鲇川的全部要求，把日产会社迁进满洲，接管并实行对满洲重工业的综合经营。其中曾明确规定，在日产会社迁至满洲后，对其资产和分红要予以保证。即以10年为第一期契约期间……伪满对于其向满洲国内经营事业的资金总额，保证年六分的利润，同时规定，在利润分红达到实缴股分的年七分五厘以下时，按政府股分一，其他股分二的比例分红……。

满业的设立，使满铁及其业务蒙受相当大的影响，然而，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是不会事先不知道的。关东军司令官不能不同松冈联系。所谓长州藩两巨头互相商量也是理所当然的。鲇川是松冈洋右的亲戚，两人关系很深。同样，从长州出身的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又是日产迁移满洲的主导人物。正因为如此，事无一连串处理都是很圆满的。后来竟传出这样的话：“操纵满洲的两个キ，三个スク。”这就是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他们是一丘之貉。

总之岸信介在日产进入满洲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部计划的拟订、关键问题的交涉，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他被看作是满业的创始人。满业按照岸信介的计划推行统制经济，在日满经济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岸信介挺身而出公然辩解说：“当突然发表成立重工业会社时，据说无论是日本，还是满洲都相当吃惊。但是我认为正是由于事前的保密才导致了事情的成功。而且，至今还痛感正因为是鲇川才干得如此出色，将扎根于日本的事业，全部迁来满洲，这并非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事情。”他还说：“满洲国目前为了开发资源，欢迎一切资本。由于日产全面进入满洲，有人认为其他资本已无进入的余地，或不会再有人向满洲投资。实际上，其他领域并不拒绝一切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流入。例如：煤炭液化不由重工业会社经营，三井正在

着手开发。”^①

岸信介积极推行统制经济，实施《重要产业统制法》，设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使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的打击。由于用于工业生产的煤炭和钢铁最初实行限额供应，逐步地断绝供应，这样，就先使一些小型的铁工厂和小工业小铁炉纷纷破产，后来素称代表中国民族资本的大连顺兴铁工厂、沈阳兴东铁工厂、哈尔滨振兴铁工厂等也被迫先后倒闭，而被满业取而代之。同时，又由于对粮棉油类农产品实行统制，使东北的民族资本油坊业、磨坊业、纺织业因断绝生产原料的来源而陆续倒闭达数百家。随后，满业则将中国民族资本家旧存的钢材、铁、机器设备，全部以极低廉的价格掠夺了去。而当时仅有的几家民族资本企业如大连政记轮船公司、长春裕昌源、哈尔滨双合盛等，只是因为有几家日本人股东和日本人顾问才得以延续下来。

东北的商业多是小本经营，虽然有几家巨商，但也不是日本垄断资本的对手。岸信介实行统制经济，使华商原来由日本进口的货物来源被日商所垄断；伪满工厂的产品实行统制又不能自由地由华商购买，几乎断绝了正常的进货渠道。而伪官吏的日用品是由伪满政府所设立的官吏日用品消费组合供应，各会社（企业）职员日用品由它的消费组合供应，一般日本人的日用品由满洲生活必需品会社和日本人经营的大商店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华商百货商店虽然顾客多，但因没有货源，故营业很不景气。

当时按各行业建立了许多种类的组合。这种组合就是对某类物资的掌握和分配销售的一种行政组织。凡是经营某类商品的商店，必须加入某种组合，否则组合就不供应此类商品。岸

^① 1937年12月6日《满洲新闻》。

信介推行这种统制经济，使一般商店都要加入几个到十几个组合。以长春振兴合为例，即加入了五金、瓷器、鞋帽、裁缝、绸缎、服装和贸易等十几个组合，又参加了百货店组合。这个百货店组合供应的物品比较全面一些，但是能够参加到这个组合的中国商店在长春只有泰发合与振兴合两家。因为这时日本还高唱“日满亲善”、“共存共荣”，如果没有一两家中国人的百货商店参加组合，未免太露骨了。为了限制更多的中国人百货商店参加组合，以“直接营业场地面积必须在1500平方米以上”作借口，把其他百货商店，包括长春玉茗魁等大中型商店也被拒之门外。当时长春日商参加的有宝山、三中井、金太、日毛、平本等商店，加上泰发合、振兴合一共是七家。虽然泰发合、振兴合能够参加组合，但是在分配商品的时候，并非是一视同仁同等相待。一般性的商品七家商店平均分配，可是畅销商品，则在“不适于满洲人消费”的藉口下，不分配给泰发合与振兴合，只分配给五家日商把商品卖给日本人。

在岸信介推行的统制经济下，各行各业每月分配的商品很少，很快就卖光了，因此物价逐渐上涨。后来，岸信介虽然调回日本政府任事，但是他的统制经济政策依然继续推行。1941年7月25日，突然发布物价停止令，通知所有商店进行盘点货物，并注明各种商品的销售价格，以当天的价格为标准进行交易，7月25日以后，不得涨价，因此“七·二五”停止令实施后，给民族资本的商业带来的损失更大。如在“七·二五”时，一般毛料为10元1米，待各商店内现存的毛料售完后，组合则不再配给同样质量的毛料，而分配棉毛混纺的料子代替毛料，但价格每米批发是12元，商店零售则每米为14元。以后，混纺料也逐渐没有了，再配给的就是用破旧棉花纺出的线织成的更生布，进价每米18元，零售价则为20多元了。这样一来，每米10

元的毛料没有了，而需要拿出20多元钱买1米更生布，可见物价暴涨了许多倍。总之，在“七·二五”停止令以后，一些商店把好的东西都贱价卖光了，而花较多的钱买来次一等的商品；次一等的商品又卖光了，而需用更多的钱买来更次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5月18日振兴合终于倒闭了，赔了50多万元。这就是岸信介推行统制经济给中国民族工商业造成的灾难的一例。诸如此类事例在伪满司空见惯。

岸信介推行统制经济，在农产部门根据“资源调查局”调查的资料，为了掠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需要的粮食，在1938年制定了《兴农合作社法》。根据本法，伪满政府与日本财阀共同出资2000万元创立了“满洲兴农合作社”。在岸信介操纵的产业部指导下，禁止粮谷的自由买卖，规定由兴农合作社独家收购。同时，又以3000万元资金创立了“满洲农产公社”，仍在岸信介操纵的产业部指导下，担当粮谷的保管、调拨、运输任务。为了对农产品实行统制，于1938年冬公布了《米谷统制法》，设立了满洲粮谷株式会社。1939年11月又公布了《主要粮谷统制法》。该法规定统制的对象包括高粱米、小米、苞米等普通农产品，而这些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价格，均须由伪产业部许可，用以防止主要粮谷外流，而保证日本国内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此外还根据法令规定，来确定各省县农村耕种农作物的种类、数量和出荷量。执行的结果，使每年约有1000万吨的粮食被日本殖民者掠夺去，为以前出口粮食的两倍半。

1938年公布《米谷管理法》以后，又开始实行口粮配给制。粮谷配给店对居民人口进行登记，根据登记的户数、人数，确定配给量，向配给组合领取粮谷，供应居民。当时以民族不同、饮食习惯不同为藉口，实行日本人的配给数量优先得到保证，而且在品种上，日本人吃大米，朝鲜人吃小米，中国人吃高粱米

和苞米，违者按经济犯处置。伪满中后期，对中国居民粮食配给数量不断减少，人们吃糠咽菜，以糠子面充饥，亦难以饱腹，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

(三)

1937年岸信介进入伪国务院总务厅任次长。他一方面以总务厅次长的职权推行他倡导的统制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关东军向日本华北驻屯军建议在日军占领区域内迅速建立伪政权的同时，设立兴亚院。它的性质相当于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操纵华北伪政权，以便以日本、伪满、华北的资源为中心，建立所谓“日满华经济一体化”体制，成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亚洲战争所需要军用物资的生产供给基地。

为了实现岸信介的这个建议和计划，日本殖民者每年春秋分别召开两次所谓日满华三国经济一体化会议（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这个会议地点定在当时大连的几家日本式高级饭店。每次会期为4天。日本政府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内田外相兼企划院第五部部长（负责物资动员计划的）；伪满参加的是伪总务厅次长（负责物资动员计划的）；华北方面参加的是日军华北军参谋长和兴亚院次长或长官。大连会议的内容是研究如何迅速大量地生产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和大量开发这些军用物资的资源，并确定所谓日满华三国所分担的供给任务。同时，为了迅速获得军用资金，振兴日本国内轻工业，也是这个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

大连会议确认，日本国内平原地区少，山岳地带多，不适合发展重工业，并且从事重工业劳动的多是男性。日本的男人，除了将进入老年人的，从事耕种外，青年人多是被征入伍到前线去了，剩下的女人多适合参加轻工业生产，遂确定了在日本

国内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方针。另一方面利用伪满和华北的广阔平原、丰富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发展重工业，生产煤炭、钢铁、盐，每年按规定的数量运到日本。在日本国内用这些产品做动力和原料利用原有的重工业一方面生产枪炮、飞机、坦克、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以供给侵略战争的需要；一方面生产机械设备，输出到满洲国和华北。据伪满总务厅次长谷次亨回忆，1939年根据大连会议的规定，华北开滦煤矿为了供应日本国内炼钢用煤向日本输送了90万吨开滦煤。华北的天津按照规定向日本输送了60万吨盐。伪满向日本输送钢铁30万吨，原煤120万吨。

根据岸信介的计划，在华北和南京伪政权先后成立不久，就主张把华北、华中的重工业企业操纵过来，成立一个综合经营体制的重工业部门，表面上标榜开发华北资源，以开发产业振兴民生为目的，实际是像伪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那样，把华北和华中中国经营的工矿企业掠夺过来。于是，日本财阀仅出资4亿元作为初期成立资金，设立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这个会社名义虽是“华北”，但是实际上还包括了华中、华南，即把日本军队占领地区所有的工矿企业，都统制起来。

就这样，岸信介通过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把中国关内外日本占领区重工业部门的资源及与此有关的附属工业需要的原料全部垄断起来，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供给基地，树立了“日满华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把日本70多年来的自由主义经济改变为国防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感到有雄厚的物力来支援战争，其侵略野心愈加猖狂。

(四)

日本侵华时期，掌握日满华三方面供给日本侵略军军需物资的总机关是日本商工省。它的大臣和次官不仅必须是熟悉日本国内情况，而且还要了解伪满洲国和中国内地被占领地区情况的人。岸信介原是日本商工省工务局长，又是执行伪满和华北物动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于1939年秋，他在日本陆海空军的要求和日本垄断财团的期望下，回到日本商工省任职。他历任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营等内阁商工省次官。1941年他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1942年，他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当选众议院议员。1943年商工省合并于军需省，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大臣，岸信介任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

岸信介在1939年10月转任日本商工省次官时，关东军参谋长饭村让中将在军人会馆为岸信介设宴相送。他在致送别词中说：“阁下在满洲国虽然为期不久，但所建立的功绩是卓著伟大的。阁下在满洲国所计划的各种事业，关东军不仅不改变任何一点，而且尽一切力量去实现它，以不辜负阁下的期待。尤其是经阁下的提案而建立起的日满华经济一元化的体制，关东军尽可能地和华北军协力，使其更迅速地发展和巩固起来，以便它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发生巨大的作用。”

1940年，岸信介曾到华北视察他所计划的日满华经济一体化体制的实施情况。他曾和华北军参谋长河边中将、副参谋长有末少将、兴亚院院长盐泽中将等人秘密策划把华北的中国人强制迁往外地，把东北的中国人强制迁到华北，使更多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迁入东北，使东北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领土。

岸信介在日本商工省和军需省任次官和大臣期间，全面负责制定战时经济统制计划，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供应调配，

成为几届内阁首相的得力干将。1944年7月7日，美军攻克日军死守的塞班岛。岸信介认为塞班岛必将成为美国的空军基地，日本将要落入美国空军B29型轰炸机的轰炸范围，日本工业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主张在不胜不败的情况下结束战争。东条英机十分恼火，认为岸信介是干予军事统帅大权，气忿地向岸信介说：“既然如此担心，就把日本的工厂全部转移地下。”岸信介毫不示弱地反驳说：“那是不可能的！”东条命令岸信介辞职。岸信介抗命不遵，拒不辞职，居心搞垮东条内阁。结果迫使东条内阁因意见不统一而于7月18日总辞职。当时岸信介想当结束战争的内阁首相，但未能实现，因为东条英机指使宪兵监视他，使他无法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家乡山口县田布德町。

1945年日本战败，岸信介的老师杉敏介曾写信劝他珍惜名节，承担战争罪责，引咎自尽。他却以《短歌》回赠说：“圣战的名声将流芳于后世。”同年9月15日，岸信介以甲级战犯嫌疑被盟军总司令部逮捕。12月8日被移送巢鸭战犯监狱。他在狱中写下《狱中断想录》，竭力为自己和日本的侵略战争推卸罪责。1948年12月，岸信介被释放。

1956年，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25日至1960年6月23日，他连续两次组成岸信介内阁。这时他不仅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恶，而且还明目张胆地鼓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最后被日本人民推下了台。